

解决“美真二分”的难题如何可能?

胡晓明

(华东师范大学 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、中文系,上海 200062)

摘要:关于《世说新语》所表彰的“魏晋风度”或“晋宋风流”,学术界历来有两大解读范式,一是鲁迅《魏晋风度与文章与药与酒的关系》以及余嘉锡《笺疏》所代表的历史主义的诠释路线,旨在将“风流”与“美”还原为政治,尤其是权力斗争;另一种则以宗白华、冯友兰、李泽厚为代表,将风流与美,单独拈出,作为这个时代士人精神创造的新成果,此一分歧,学术界称为“美与真二分”难题。龚斌的新著将历史考掘的正解,与美学建构的通识,有机地结合起来,不仅探求时代新创与思想大义,而且更发皇其中不得不如此之苦心孤诣、复杂而深细的美感心曲,考察“美的意识”在不同情形中不同的表现。正是在这个意义上,龚著之所以后出转精,正由于作者在正解与通识之间,保持了一种恰当的平衡,这正是他一个突出的特点。因此,不仅有具体注释学上的重要价值,而且有中国美学全局意义的重大启示。

关键词:美 真 《世说新语》

一

《世说新语》包含着传统中国文艺思想的重大信息。迄今关于《世说新语》的注释已有不少。我手上就有五六种,如余嘉锡《笺疏》、徐震堃和杨勇《校笺》、朱铸禹《集注》以及吴金华的《考释》等。每一种都有它的优点,或重辞语,或详史料。但是多年以前,我与学生每周读书会,一起读这本大著,就苦于每一种都不能完全满足需求。或者辞语的解释,扞格难通;或者深意的解读,未达一间。倘要一册在手,既能有求必应,全面解决各种阅读细节问题;又能发皇大义,着力揭橥《世说新语》究竟“新”在哪里,融定本之集大成与新著之掘井及泉于一炉,仍有待于来者。

龚斌教授花了十年功夫,完成了一部《世说新语校释》^①,并要我写一篇序,我开始有些耽心与怀疑:余季豫嘉锡先生,史学大家也,精考群籍,钟爱《世说》,“一生所著甚多,于此最为劳瘁”,自一九三七年至一九五三年,“十余年间,几乎有一半时日用在这部笺疏上了”(周祖谟语)^②,而吾兄企图“取而代之”乎?

然而这正是我一直所期待的新注本:既回答《世说新语》的重大问题,又总结自古迄今的丰硕成果,融集大成之美富、与识大体之新颖为一炉,确是有份量的大书。这里,我要根据我的阅读体会,实实在在写出我这样说的理由,以不负作者、不负读者。

二

首先,集大成的注释本,只要有充足的资料、下足够的功夫,以极大的耐心,在种种细节问题上,斟酌比较,求新求精,不难后来居上,取得较大的成绩,这方面,龚著无论辞语的考释、史料的辑补,还是疑难的解释、评论的搜集,都无愧为集大成,然而,集成之作,会不会迷失在细节的森林里,该不该回避根本问题?我们阅读时仍要问《世说新语》之“新”究竟“新”在哪里?这部书究竟提供了什么样的社会历史嬗变的重大信息?这种社会嬗变及其思想文化结果,在中国历史的长河中,有没有增添什么重要的新价值?这其实是《世说新语》这部大书的大义。见木又见林,不仅需要

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地重大课题“中国文化意象的再生产”(编号:08JJD720032)阶段性成果。

作者简介:胡晓明,华东师范大学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研究员,中文系教授,文学博士。

对历史横截侧面的洞见;观水观澜,更有赖于对历史纵贯整体的通识。

举个例子来说,能不能暂时放下西方舶来的“小说”概念,从中国的文体发展本身,即《世说新语》的文体特征上来通观前后?因为“小说”在上古文献含义中,是与“经史”相对,带有贬义的一个名称。《世说新语》在当时不被认为是“小说”。最近,有一项最新的研究成果发现“语”,其实是一种非常古老的文类,无论是以“语云”、“古语有之”、“闻之”形式散见于各家著述,还是不少以“语”的名称(如《论语》、《国语》等),或成篇或结集,先秦时期的各种嘉言善语,极为美富,完全可以肯定地说,这是一种失落已久、十分重要的古代文体或远古教材。“语”之为“体”,其宗旨是“明德”,其功能是贵族社会的培训与教化,其形式特征,兼有语文的精炼修辞与叙事的感染力^③。直到汉代社会,贾谊的《新书》(《礼容语》、《修政语》的一部分),还用来教育梁王、长沙王,陆贾的《新语》,还用来“蔓衍杂说”、“博明政事”,我想,“语”之为体,区别于“六经”,可能正是它比较亲切、比较直接、比较有现场感,也比较简洁精炼,仍然是政治教化功能为第一的!然而,到了临川王刘义庆的这里,以讲明政治、采取成败、教化社会为中心的“明德”之“语”,分明已经转化而成了忽略政事、弃言成败、专注于贵族士人思表纤旨、谈外曲致、超俗风度、卓异心智的“风流”之“语”,如《世说》王戎论“德”“言”分立:

王戎云:“太保居在正始中,不在能言之流。及与之言,理中清远,将无以德掩其言!”(德行第一)

从立德到立言,标志着重“语”的时代出现。尽管,“语”的文类特征依然潜存着,即亲切、直接、现场感,以及语文的游戏精神:精炼、隽永、以及“文”“道”互为体用的自觉与执着。既游戏小道、又教化大义,这正是“语”的文体张力!如果从“语”这一古老文类的自身嬗变来看,我们似更可以看出,临川王刘义庆以及他的文学宾客,并不简单就是群居终日,消闲风趣,言不及义的,他们有一种新的创造与发明的冲动,或者说,我们由其中可以看出,传统士人创造语言财富以经营人生新意义,一种前后相续的努力,以及这一传统在新的危机时代与破裂社会起死回生的力量,这样看这部书,或许比古代丛残小言的“小说”,或单纯

用西方注重小说人物形象或叙事中心的理论,或更能探得骊珠,发明《世说“新”语》的时代心态与一群卓异作者精神心智的创意所在?

作者正是着眼于此。龚斌教授是陶学名家,长期研陶的学术熏陶,使他不仅对于古代中国最重要的精神价值,十分珍视;而且对陶渊明所处的时代,以及他立身处世的环境,以及其思想之所以如此之深曲缘由,有深切的同情了解。先立乎大,从治学的角度来说,从大家入手,手眼自高,因而作者不会将《世说新语》单纯视为一部孤篇横绝的“小说”,而是有意识地将《世说新语》视为前后相续而富含新信息的一种大书,视为担负六朝时代新知识人重大使命的一部新经典,这就超越了单纯的文章游戏与辞语训释钁钉琐屑之学。其实新经典之所以“新”,卑之无甚高论,即在于彼时整幅之时代精神,群趋于以创造个性、发明美感为旨归。如作者前言所说“《世说》真实地记录了由道德范型的人格审美向个性至上的人格审美的转变。描写他们的形神之美:容止的漂亮、行为的纵放、风韵的潇洒、精神的自由,历千数百年仍栩栩如生。”作者认为,《世说》文化底蕴的挖掘还仅在浅层,美学精神与意义的批评才刚刚开始,而此一新著,正是以解读其中的深层内涵,悬为高格。我以为,这一识见,已经决定性地使龚著区别于目前《世说新语》的所有注释本了。

三

然而,这个“美的历程”,当然不是孤零零、光秃秃或整齐划一的意识形态,而是与政治、权力、思潮有着复杂纠结的联系。我们看关于《世说新语》所结晶的“魏晋风度”或“晋宋风流”,学术界历来有两大解读范式,一是鲁迅《魏晋风度与文章与药与酒的关系》以及余嘉锡《笺疏》所代表的历史主义的诠释路线,旨在考掘名士“风流”背后政治人生的血色底蕴与历史暗处的真实困境,将“美”还原为政治,尤其是权力斗争;另一种即以宗白华、冯友兰、李泽厚为代表,将风流与美,单独拈出,作为这个时代士人精神创造的新鲜成果,并将其从历史中剥离出来,成为中国美学史、中国士人精神史中的一个部分。此一分歧,学术界称为“美与真二分”难题。至今越来越清楚的是,全然

将美从活生生的历史中孤零零地抽离出来,成为一种独立的美学史,其实并不符合中国文化的传统,不过是二十世纪西方中心主义的某种神话而已;然而,完全无视这个时代的精神创造,将一切精神的价值,都还原为人事的斗争或利害的取舍,这当然也不免有简单化约之弊。比较正确妥当的是,将历史发掘的正解,与美学建构的通识,有机地结合起来,不仅探求时代新创与思想大义,而且更发皇其中不得不如此之苦心孤诣、复杂而深细的美感心曲;不仅对美的发明有一般意义上的认同,而且更辅之以具体的精细的分析,考察“美的意识”在不同情形中不同的表现。正是在这个的意义上,龚著之所以有综合创造之功,后出转精,胜意纷呈,正由于作者在正解与通识之间,保持了一种恰当的平衡,这正是他另一个突出的特点。

譬如,有没有对那个时代士人政治心态同情的理解?美的情感,与宏大的时代政治情感,是何种关系?余嘉锡笺释《世说》之时,正是抗战极艰难岁月,深抱家国之忧与身世之感,故与东晋南渡士人心心相印,对其时代大苦境,有真切的体会,说得十分深刻。龚著大力表彰甚多,如云:

卫洗马初欲渡江,形神惨赖,语左右云:“见此芒芒,不觉百端交集。苟未免有情,亦复谁能遣此!”刘应登称其“微辞逸旨”,直作玄理看;刘辰翁则称“非丈夫语”,皆未得卫玠北来之情怀。余笺谓卫玠“当将欲渡江之处,以北人初履南土,家国之忧,身世之感,千头万绪,纷至沓来,故曰不觉百端交集,非复寻常逝水之叹而已”。其说深刻,超二刘远矣。(言语第二)

这就表明,后世乐道,所谓观水叹逝的“微辞逸旨”,仅是一种年岁悠久、人事湮灭,多番淘洗而留下来的美感抽象,这种抽象,对历史中的真实生命,缺少同情。研究中国美学者,往往由此而坠入空疏的魔道。余氏的史识,确有点醒之功。然而余著也同时有一个局限:或许也正是时代系念太深,投射一己之心绪过甚,往往从“同情”上升到批判,矛头直指士人对时代的无力、无责任,而忽略了《世说》中所表彰的士人精神心态,自有其超越性与创造性的一面。对此,龚著一方面观其新变,识其大旨;如云:

关于正始清言之评价,褒贬纷纭,迄

千百年无定论。蔑视礼法,任情纵诞,固然为清言流弊,然演说《庄》《老》,辨析义理,会通儒道,实开思想及美学之新境界,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占有重要地位。至于西晋覆灭,主因为王室内乱所致,全归咎王、何与林下诸贤,斯非公允之论也。(赏誉第八,“王敦为大将军”条,校释二)

如果说,这是一个“通识”,尚要回到具体事实的解读,还需要史实的“正解”,那么,一方面,听一听历史人物自家的在场发言,为“正解”的第一要义:

王右军与谢太傅共登冶城,谢悠然远想,有高世之志。王谓谢曰:“夏禹勤王,手足胼胝;文王旰食,日不暇给。今四郊多垒,宜人人自效;而虚谈费务,浮文妨要,恐非当今所宜。”谢答曰:“秦任商鞅,二世而亡,岂清言致患邪?”(言语第二)

明案:谢安之语,极为清醒沉痛。言下之意,不仅知识人不负这个责任,而且直指无道的执政者,才是历史兴亡真正的罪魁祸首。这里,是中国千年历史石破天惊的“正解”,而谢的“悠然远想”之中,亦是隐藏着历代士人莫名、莫诉的巨大悲伤。

另一方面,“正解”更以余笺的方式超越余笺,即借助于陈寅恪的如炬眼光,考掘历史人物不得不如此之苦心孤诣,以摆落余著判断偏于主观之弊。如对王导的评价,余笺是严酷的贬斥,而龚著更有同情的了解:

王导晚年“略不复省事”,故人言其昏庸耳。然导云“后人当思此愤愤”,甚自信己之治政理念。导卒后,果然殷羨非庾冰而是王导,谢安亦赞之且为政彷彿茂弘,后人真有“思此愤愤”者,而其中深有原因焉。余笺轻议王导“正封策诺之”为“望空署白”,与朱子谓王导“只周旋人过一生”略同,看似正论,其实皆不切实际。宋曹彦约《昌谷集》二一评王导云:“按导以识量清远之资,识元帝于潜龙未用之时。在洛阳则劝其归藩,镇建业则劝其兴复。患难未除,则讨陈敏余党以振起之;士论未归,则引名贤骑

从以厌服之。勤力王室,不肯作楚囚对泣。去非急之务,行清静之政,置谏鼓、立谤木,使晋氏偏有东南,称制者十有一帝。导身相三君,每见亲任。辅佐中兴之功,不可掩也。”陈寅恪《述东晋王导之功业》云:“导自言‘后人当思其愤愤’,实有深意。江左之所以能立国历五朝之久,内安外攘者,即由于此。故若仅就斯言立论,导自可称为民族大功臣,其子孙亦得与东晋南朝三百年之世局同其废兴,岂偶然哉!”如此议论,方具史识矣。(政事第三,“丞相末年”条,校释二)

王导之所以无为、清静,其实是一种政治哲学,着眼于民族融合的目标,松开权力争夺的焦虑,放低高压统治的身段,经营从容宽裕的环境。陈寅恪对王导“愤愤”典掌的解读,颠扑不破。这似可以引申为魏晋风度的一个模式,即特定的士人美学,来源于特定的士族政治。另一佳例即龚著对谢安“雅人深致”的考掘:

故谢安“雅人深致”之赞许,后人多茫然不解。唯有王夫之稍有体会,其《姜斋诗话》二云:“谢太傅于《毛诗》取‘吁谟定命,远猷辰告’,以此八字如一贯珠,将大臣经营国事之心事,写出次第,故与‘昔我往矣,杨柳依依,今我来思,雨雪霏霏’,同一达情之妙。”此解颇给人启发。谢安称许“吁谟定命”二句,与先秦引借诗喻志相似,乃表其心曲而已。安此时虽身在东山,实已心向魏阙,“吁谟定命”二句,正与其欲经营国事之心曲相合。《晋书》本传载,安放情丘壑,再三拒绝朝廷征召。时简文作相,曰:“安石既与人同乐,必不得不与人同忧,召之必至。”以为谢安必会出仕。安妻为刘惔之妹,见刘家富贵,乃谓安曰:“丈夫不如此也?”婉转地劝安出仕。安掩鼻曰:“恐不免耳。”可见,安已预感不免要出山。升平三年(359)冬十月,安弟谢万奉命北伐南燕,结果一败涂地,被废为庶人。谢万黜废后,谢安始有仕进之志。据上述材料推测,谢安与子弟集聚评《毛诗》,或在谢万黜废前后。“吁

谟”二句正写出谢安之心事:确定远谋大略而不改易,到时布政于邦国都鄙以施行之。此殆所谓“雅人深致”也。(言语第二,谢公因弟子集聚条,校释五)

尽管有时,政治与美感的关联,还只是某种隐然的相干性。譬如:

祖约好财,为时人所讥,此固无须赘言。阮孚集好屐,虽亦为一累,然所叹“未知一生当着几量屐”,以闲淡之语,感慨人生不永,语言隽永,意味深长,人物个性全出。时人遂以定胜负,可见晋人人物品鉴以闲畅为美。钱穆谓晋人估价之标准本于内心及精神态度,其说得之。(识鉴第七,“谢公领中书监”条,校释四)

明案:盖好财为时人所讥,祖约已先输一着。“士人创造语言财富”的努力,胜过创造物质财富之愿力,以及语言财富之创造能力,成为贵族社会心理群趋之鹄的,无疑既是自先秦以来士人文教社会的旧传统,又是魏晋以还时代变化的新自觉。如果说,这背后仍有一种政治,即士族经营其超越一般豪强富贵人生的精神高贵性,以此强化其社会优越性,更凭借创造语言财富之力,以增进其社会与精神资本,增强其文化权力与地位,因此,政治与美学之间,在这里仍有一种不“相干”的“相干”,然而可不可以将美感与政治的相干,视为一种绝对化的模式呢?龚斌发现,其实还有一个相反的模式,即政治与美学两不相干。余笺的一个特点是处处深掘当事人的利害、由利害寻求是非,而龚著往往点醒利害、是非之外,别有其超利害是非之美感存在。这就足以补充余笺。如云:

王恭与王忱虽有仇隙,然每至兴会,犹不免相思,此同本篇一四七谢公与东亭虽不相关,但“正自使人不能已已”相似。此又可证晋人于人格美不能忘怀,甚至能超越利害关系。(雅量第六,“王恭始与王建武甚有情”校释九)

魏晋极推重人物之神韵美,诸如神俊、闲旷、容止不凡等一类人物,为人们普遍崇拜。美自有不可抗拒之魅力,不可摧残褻玩。《容止》三八记庾长仁与诸弟入吴,欲住亭中宿。诸弟先上,见群

小满屋 都无相避意。长仁曰“我试观之。”乃策杖将一小儿,始入门,诸客望其神姿,一时退匿。《贤媛》二一注引《妒记》:桓温平蜀,以李势女为妾。郡主凶妒,拔刀往李所,欲砍杀之。然见李姿貌端丽,神色闲正,不觉掷刀抱之曰:“我见汝犹怜,何况老奴!”上述事虽不同,但究其实质,皆是重神、尚美风气之体现也。(雅量第六,“桓公伏甲设饌”条 校释五)

这里“虽有仇隙,然每至兴会,犹不免相思”,以及“见汝犹怜,何况老奴”,分明已超越了政治功利、现实利害,凸出了美的独立价值,这不仅为魏晋时代最为看重美之嘉言善语,最为“新”语之典型,而且也是传统中国最唯美的古典之一。只要承认,尽管中国历史与人生,充满血雨腥风,然华夏民族之所以艰难辗转,历劫不败,除了刚强之生命意志与高度的理性精神,仍有深情、痴想、求美、重神的执着心念,化干戈为玉帛,转暴戾为祥和,其中不能不有美的一份力量,于是,我们不能不承认《世说》中美的发明与追求,自有一份庄严的自觉与高贵的尊严。

四

其实求美与求真,完全是可以并存,相互说明的。譬如对“树犹如此,人何以堪”的诠释,龚著说:

柳树枝叶纷披,婀娜多姿,《诗经》即有“杨柳依依”之句。古人视为珍木嘉树,不乏咏唱。如枚乘作《忘忧馆柳赋》,以后曹丕、陈琳、王粲、应瑒、傅玄、成公绥诸人皆作有《柳赋》,柳树几成美好事物之象征。视当年依依弱柳,今摇落而变衰,不禁由物及人,而生“人何以堪”之深长喟叹。故桓温金城泣柳,并非仅是英雄迟暮、北伐大业未成之悲伤,更是对万物变动不居以及个体生命短暂易逝之深沉体验,遂成魏晋人一往情深之典型形象,凄美独绝,历千万年而魅力永恒。(德行第一,“桓公北征经金城”条 校释二)

如果说,“英雄迟暮、北伐大业未成之悲伤”,乃属历史真相的正解,那么,“对万物变动不居以及个体生命短暂易逝之深沉体验”,即为美感经验的通识。通者,变通、会通、不胶执、不单一,触类旁通、由此及彼、由小见大,即在正解的基础上,又能同时兼具更综合性、普遍性、广泛性的理解,方以智,不废圆而神。

因而我认为,具体情况的具体分析,以及历史地变化地看问题,是解决自来“魏晋风度”美与真二分难题的最好途径。譬如,《世说新语》的时代,创造与企求美的意境,最大的思想资源,即是重新发明庄、老、易思想。但是同为“庄、老、易”,在不同的人,不同的时期,确有不同的功能与意涵,不可一刀切。以《世说》为例,我想至少有三种,一是以庄老为反抗之武器,一是以庄老为保身之烟幕。三是以庄老为语言之桃花源。前两者比较好理解,鲁迅《魏晋风度与文章与药与酒的关系》,已经揭发,嵇、阮,其实并不真的反儒家、反礼法,而是司马氏集团利用儒家礼法,夺取政权,因为嵇康的“非汤武而薄周孔”,是一种现实政治批判,矛头直指假装信奉儒家的司马氏。而阮籍的醉酒佯狂与不守礼法,亦不过是在“名士少有全者”的时代,全身保命避祸,所施放的一种烟幕而已。极而论之,施放烟幕成为一种漂亮的“文饰”。如余嘉锡笺有云:

余笺“《易·丰卦·彖》曰‘日中则仄,月盈则食。天地盈虚,与时消息。而况于人乎!况于鬼神乎!’”锡嘉案:山涛之言,义取诸此,以喻人之出处进退,当与时屈信,不可执一也。然绍父康无罪而死于司马昭之手。《礼》曰‘父之讎,弗与共戴天。’此而可以消息,忘父之讎,而北面于其子之朝,以邀富贵,是犹禽兽不知有父也。涛乃傅会《周易》,以为之劝,真可谓饰六艺以文奸言,此魏晋人《老》《易》之学,所以率天下而祸仁义也。”(政事第三,“嵇康被诛后”条,校释五)

因而除了利害,没有美丑,没有是非、没有黑白。学术,不过是现实利害的烟幕而已。而什么叫“语言之桃花源”?“庄老”在这里,既不是斗争的武器,也不是保身的烟幕,而是一种“创意”,是士人身处巨大的痛苦与悲伤的时代,暂时放下危

疑苦境的存在感受,而另外发明一种言外之意、韵外之旨,创造语言之美的精神乌托邦,以安顿自由生命的美与尊严。从龚著中大大小小的各项掘发,可以看出一幅完整的图景。譬如下面数则,大都出于“言语篇”,皆有关对政治恐怖与无道的调侃:

中朝有小儿,父病,行乞药。主人问病,曰“患疟也。”主人曰“尊侯明德君子,何以病疟?”答曰“来病君子,所以为疟耳。”(言语第二)

佛图澄与诸石游,林公曰“澄以石虎为海鸥鸟。”(言语第二)

桓玄既篡位后,御床微陷,群臣失色。侍中殷仲文进曰“当由圣德渊重,厚地所以不能载。”时人善之。(言语第二)

孔文举有二子,大者六岁,小者五岁。昼日父眠,小者床头盗酒饮之,大儿谓曰“何以不拜?”答曰“偷,那得行礼!”(言语第二)

王祥事后母朱夫人甚谨。家有一李树,结子殊好,母恒使守之。时风雨忽至,祥抱树而泣。祥尝在别床眠,母自往闇斫之。值祥私起,空斫得被。既还,知母憾之不已,因跪前请死。母于是感悟,爱之如己子。(德行第一)

或以传奇、以嘲戏、或以含蓄、或以机智,化解无道政治的暴力,将埋藏着巨大悲伤的压力,转而成为语言游戏的胜者,得到一种“语”的超越,这正是“清言”崇尚时代的权力转换游戏。“清言”有时是透过极为含蓄而隐秘的“语”艺,激发读者仔细体味当时士人心中巨大悲伤,如陈元方谈论府君与家君:

颍川太守髡陈仲弓。客有问元方:“府君如何?”元方曰“高明之君也。”“足下家君如何?”曰“忠臣孝子也。”客曰“《易》称‘二人同心,其利断金;同心之言,其臭如兰。’何有高明之君,而刑忠臣孝子者乎?”元方曰“足下言何其谬也!故不相答。”客曰“足下但因佞为恭而不能答。”元方曰“昔高宗放孝子孝己,尹吉甫放孝子伯奇,董仲舒放孝子符起。唯此三君,高明之君;唯此

三子,忠臣孝子。”客惭而退。(言语第二)

龚著一反群说,认为陈仲弓受髡,宁信其有。明案:明明是刑父之痛,陈元方却出之以莫名的反讽。历史的悲剧正在于,往往是高明之君,迫害忠臣孝子。最深重的悲剧正是根本不知悲剧的凶手是谁。这不是个人的问题,而是历史的暗处看不见的凶手的问题。由此说出士人生态的险恶,透出何等巨大的悲哀。我们看向秀在文帝面前不敢再言箕山之志、覆巢之下岂有完卵的小儿语、李喜在司马氏面前畏法而至、以及钟会兄弟在文帝面前战战惶惶,都没有这里的悲伤如此惊心动魄,却出之以不动声色的人物语言。这应该是“语”的创造的一种奇观。

《世说》中当事人的生命世界,亦常常有政治失败与语言胜利的相互转换,譬如简文帝其人,一方面是在桓温的强权暴力之下挣扎:

简文初即位,桓温奏废太宰、武陵王晞及子总,又逼新蔡王晃自诬与武陵王晞等谋反,皆收付廷尉。又杀东海王二子及其母。温执意要杀武陵王晞,简文不许,手诏报曰“若晋祚灵长,公便宜奉行前诏。若其大运去矣,请避贤路。”面对桓温之肆无忌惮,简文忍无可忍,强作反抗,才使温“不复敢言”。然简文终究已成桓温掌中傀儡。(言语第二)

另一方面,又不妨其以妙赏、深情,赏爱园林之美,体察“鸟兽草木,自来亲人”的意境,亦不妨其悯鼠、因悯鼠而悯人的儒道兼综情怀。简文帝的政治危疑处境,生命忧患意识,不妨其亲近自然、悲天悯人,创造出语言美之桃花源境界。又如殷顗虽知桓玄、仲堪欲夺其职,然忘怀得失,意色萧然,故“时论多之”。《世说》以令尹子文比拟之。龚著发挥大义:

令尹子文数句,令尹子文无喜无愠,颇合道家宠辱不惊,心遗得失之至人品格。嵇康《答难养生论》云“且子文三显,色不加悦;柳惠三黜,容不加戚。何者?令尹之尊,不若德义之贵;三黜之贱,不伤冲粹之美。二人尝得富贵于其身,中不以人爵婴心也。”郭象注《庄子·大宗师》云“至人无喜,畅然和适。”又云“不以物伤己也。”《庄子·田子

方》：“肩吾问于孙叔敖曰‘子三为令尹而不荣华，三去之而无忧色。吾始也疑子，今视子之鼻间栩栩然，子之用心独奈何？’”张协《杂诗》：“至人不婴物。”《咏史诗》：“达人知止足，遗荣忽如无。”谢灵运《山居赋序》云：“言心也，黄屋实不殊于汾阳。”欢戚两忘，通塞一途，恬于荣辱，为魏晋人格审美之一种。（德行第一）

殷氏身处危疑困境之中，确能暂时放下利害计较，以老庄资源创造生命意境，确是超越，是值得表彰之文化英雄。这里没有假装、没有文饰，一切都是生命的真受用。

我之所以别立“语言之桃花源”这一说法，是为了区别“武器”、“烟幕”这两种“庄老易”运用，以见出文士依凭其时代新资源，更依凭其赖以立身行世之优势即“语言创造”，在其苦难命运与巨大悲伤中，另创世界、不虚此生，达成精神开花的生命根本意义。在龚著的丰富材料与细致深入解读中，这三种方式，皆有发明，而犹以“语言之桃花源”之考掘最为大观，足以标志“《世说》时代”最具创意的精神生活与人文价值，因而相当扎实地回答了《世说新语》“新”在在哪里的问题。

五

最后要谈到，正解与通识相结合，在中国文史研究中，应是具有普遍意义的学术方法。如果我们将求解历史人物言行做事的超越意义与美学欣趣，称为求“通识”；而将求解历史人物言论行事之具体缘由，称为求“正解”，而实际的诠释过程中，往往得到了“正解”，却不能兼顾“通识”；多半顾到了“通识”，又牺牲了“正解”。如何能做到正解与通识兼顾？二十世纪古典文学研究的学术史中，我们早已从鲁迅与朱光潜关于陶渊明“静穆”之美的争论，以及陈寅恪钱锺书关于诗与史、理论与考证的范式歧出，总结得出二十世纪研究传统的可贵经验之一，即是在古典文学研究中，求真与求美，应为古典文学学术研究传统不可缺失的两

翼^④。龚著有极多极好的证例，证明了二者是可以融合的。然而近十年来古典文学研究的一个新学术思潮，即渐渐放弃对于思想文化大义、文学艺术价值的表彰与建设，即渐渐放弃“通识”，而更多致力于从社会学、历史学以及文献学的层面，解决局部的、材料的、技术的、甚至是琐屑的问题。本来，社会历史的深入了解，文献材料的广搜细析，都是中国文史之学的重要手段，但是近年来与西方新历史主义或后现代的解构思潮相互加强缘助，则手段变而为目的，渐有趋于解构、不屑建构，只讲利害，不论文学，只讲权力，不论美感的时风。有时甚至有意无意，将古人的一切优美的文学表达与美好传统，全化而为当时人的争权夺利，化而为后人版本的伪造，或后世别有用心者虚假的涂饰。这就连“正解”都放弃了。因而，当我看到龚斌自觉以陈寅恪先生的学术旨趣悬为高标，孜孜矻矻，不求速成，不立偏锋，追求正解与通识兼顾的大路，一方面是深深海底行，一方面是高高山顶立，这就是中国文史诠释的高境界。我欣喜地看到龚斌兄在攀登高峰的道路上，留下了一步步坚实的足迹，略以一己阅读思考之浅小心得，撰成数语，乐为之传播推荐。至于全书极为美富的内容，则不能尽言于万一也。

注释：

① 龚斌《世说新语校释》，即将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。本文所引用材料，全出自校释的清样。

② 余嘉锡《世说新语笺疏》周序，中华书局1983年版。

③ 俞志慧《古“语”有之：先秦思想的一种背景与资源》，上海：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。

④ 参见拙著《诗与文化心灵》中《陈寅恪与钱锺书：一个隐含的诗学范式之争》、《什么是诗文考证的正途》、《真诗的现代性：七十年前朱光潜与鲁迅关于“曲终人不见”的争论及其余响》以及《是以诗证史，还是借诗造史》诸文（北京：中华书局2006年版）。

（责任编辑：查正贤）